

第一章 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1919 年 5 月—1923 年 12 月)

学 习 提 示

1919 年 5 月至 1923 年底，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史的开始时期。这时，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世界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侵略和压迫中国，封建军阀统治着中国，而且各派军阀混战不已，中国的政治更加黑暗。但是，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逐步开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中国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个历史时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9 年 5 月—1921 年 7 月，从五四运动爆发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时的北京政权掌握在北洋军阀中的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手中。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南北分裂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世界第一次大战期间及其稍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壮大起来，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保守思想的冲击，俄国十月革命和世界革命潮流对中国的影响，都促进了中国革命新时期的到来。1919 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

幕。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第二阶段 从 1921 年 7 月—1923 年 12 月，是军阀混战和中国革命的新发展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个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帝国主义之间在华的矛盾加剧，华盛顿会议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争夺和妥协。各派军阀间的矛盾也在激化，先后爆发了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北京政权落入直系军阀手中。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改良主义思潮一度活跃。他们幻想通过政治上的某些改良以寻求中国的出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即民主革命纲领），给中国人民指出了寻求解放的正确道路。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同时也开始从事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等方面的工作。中国共产党还进行了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的联合工作。这些都为后来的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做了必要的准备。

本章学习重点：

五四运动发生的历史背景，五四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

③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

北洋军阀混战和北京政权的更迭。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

第一节 五四运动

一、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一次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

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要求和民族觉醒，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过分强大，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果实为大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所攫取，中国人民仍旧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之下。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第二年，他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随后下令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废除孙中山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公布所谓《中华民国约法》，改责任内阁制为总统制，规定总统可以终身连任。1915年5月，他为了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签订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实行帝制，自称“中华帝国皇帝”。1916年元旦，举行登基大典，取消民国年号，改称“洪宪元年”。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全国性的讨袁风暴。3月，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几个派系，他们都以帝国主义为靠山，争夺中央政权和地盘。各地方军阀也拥兵自重，扩充地盘，争权夺利。全国出现了造成人民极大痛苦的军阀割据和长期混战的政治局面。在北洋军阀系统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势力最大。皖系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控制着安徽、山东、浙江、陕西、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也是袁世凯的嫡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盘踞直隶、江苏、江西和湖北诸省；奉系军阀以张作霖为首，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占据东三省。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在北方，晋系阎锡山，盘踞山西；在西南，滇系唐继尧，占有云、贵；桂系陆荣廷，占有两广等。

袁世凯败亡后，黎元洪于1916年6月继任大总统，但实权却操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双方明争暗斗，展开了激烈的权力争夺。1917年初，日本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国，支持中国对德宣战；段祺瑞则企图借参战名义，扩充军备消灭异己，并操纵内阁，提出

对德宣战案。英国害怕日本独占中国，支持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担心段祺瑞势力过于扩张，于己不利，拒绝在对德绝交宣战的电稿上签字，并解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务。这就是“府院之争”。此时，拥兵徐州的军阀长江巡阅使张勋，在段祺瑞的暗中唆使下，伪装黎、段调停人，率兵进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拥戴溥仪重登皇帝宝座。段祺瑞看到“驱黎”的目的已经达到，遂组织“讨逆军”，于7月12日赶走张勋，取消复辟。黎元洪下台后，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因“再造民国”有功，恢复国务总理职务，重新掌握北京政府大权。8月14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但实际上中国并未派出一兵一卒参与作战行动。随后，段祺瑞政府即以“参战”为借口，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交换条件，先后从日本获得“西原大借款”5亿日元。1918年5月，日本和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及战时指挥中国军队的权力。9月，段祺瑞政府又在出卖山东主权的中日秘密换文上签字，表示“欣然同意”。

段祺瑞对内实行排除异己，武力统一的政策，明令讨伐西南。西南滇、桂军阀则纷纷宣布“自主”、“独立”，以维护自己的封建割据。

自袁世凯窃国后，孙中山为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一直同北洋军阀进行不懈的斗争。1917年7月，孙中山愤于段祺瑞的所作所为，发起了护法运动，提出“打倒假共和，建设真共和”的口号，号召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8月，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任元帅。接着，出兵北伐，护法战争开始。对南方护法军政府，段祺瑞力主“讨伐”。10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

孙中山护法所依靠的力量主要是滇、桂军阀。滇、桂军阀参加护法是为了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当直军南下，他们便立即与之勾结，出卖了孙中山。1918年5月，他们又改组和控制了军政府。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

务，离开广州去上海。护法运动失败。

此时，段祺瑞与直系军阀的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直系军队进入湖南后，立即与西南军阀暗中勾结，主张和平解决，迫使段祺瑞一度辞去国务总理职务。1918年8月，直系吴佩孚停止进攻南军，通电主和，直、皖两系矛盾更加尖锐。从1919年2月起，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举行。由于各派军阀矛盾重重，谈判于5月宣告破裂。此后，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军阀战争，南北和会就完全消失了。

二、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队伍都发展起来了。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由于它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决定了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因而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存在着经济上的联系，因而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它一方面可以和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另一方面又会表现出革命的软弱性，即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动摇性，因而不能充当中国革命的领导者。

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社会最进步的阶级，它比中国资产阶级资格更老些，阶级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强大更广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迅速增长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3年，中国产业工人大约有100多万人，到1919年，已达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同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一样，与最先进的生产

方式相联系，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它又有许多独特的优点：第一，中国工人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三重压迫，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因此，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更加坚决和彻底。第二，高度集中。他们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武汉等少数沿海沿江大城市，以及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等大企业中，便于团结战斗，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第三，中国工人阶级大多数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广大农民有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上述特点，决定了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各阶级中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它必将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另一方面，中国工人阶级也有它的一些弱点，如产业工人在全国人口总数中的比重很小，文化水平低，受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思想影响较大。这些，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

中国工人阶级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断进行着反抗剥削和压迫的斗争。据不完全统计，从 1914 年到 1919 年 5 月 5 年多的时间里，共罢工 108 次。其中规模较大的罢工斗争有：1915 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的大罢工和抵制日货的运动；1916 年天津法租界工人反对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扩大租界的斗争等。中国工人阶级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提高了觉悟，为即将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走上中国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中国社会文化思想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动。

辛亥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竭力提倡尊孔读经，大搞祭天祀孔。康有为等则叫嚷“发扬国粹，维护国俗，定孔教为国教”，一时间“孔教会”“经学会”“宗圣会”等尊孔社团纷纷出现，宣传“非复辟不能救中国”，形成了一股尊孔复辟的逆流。一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敏锐地觉察

到，要使人们从几千年的愚昧、盲从、迷信的思想状态中解脱出来，必须进行民主和科学的启蒙教育，必须开展一场新的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是以 1915 年 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从第 2 卷 1 号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为标志。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发起人。1917 年 1 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延揽许多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新青年》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北京。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撰稿。这样，北京大学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民主，是指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自然科学和看待事物的科学观点、科学态度。当时把民主和科学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取自二词英文 Democracy、Science 第一个字母的发音）。

民主，当时被称为“人权平等说”。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陈独秀、李大钊等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科学，就是提倡科学精神，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大力宣传科学思想。他们认为科学和民主同样重要，指出“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号召人们以科学态度来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破除迷信，坚持真理。

提倡民主、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就必然要批判维护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必然要批判以孔子礼教学说为代表的旧的伦理观念。陈独秀反复论证旧礼教、旧道德与民主政治势不两立，尊孔必将导致复辟，孔子思想不能适应现代生活。李大钊指出：“孔子是数千年之残骸枯骨”“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对于不合时宜的旧道德，只能促进其迅速崩溃。鲁迅在他的白话小说

《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四川著名学者吴虞也积极参加了反对旧礼教的斗争，他把封建礼教斥之为“吃人的礼教”，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是反封建的思想革命在文学方面的要求，也是它在文学方面的表现。文学革命的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主张改革中国旧文学的体裁，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同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了文学革命的大旗，主张文学从形式到内容，都要进行彻底的革命。他提出了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成为文学革命的纲领。鲁迅也积极投入文学革命的战斗，继《狂人日记》之后，他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白话小说和其他许多杂文，把反封建反礼教的革命内容和白话文的形式结合起来，树立了新文学的典范，对文学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文化运动猛烈地冲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动摇了传统的封建教条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是我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使广大人民受到了深刻的民主主义和科学思想教育，唤起了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和追求真理的强烈欲望，为中国迅速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其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它没有揭示旧文化旧思想的社会根源并进而揭示改造现存中国基本社会制度的必要性；没有把新文化新思想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形式主义看问题的方法。

三、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中国摹仿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建立了政治体制，但中国政局较以前更加混乱和黑暗。人们开始怀疑这种制度是否适合于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空前破坏性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社会的极度混乱，引发欧洲兴起社会主义革命，亚、非、拉美等洲爆发民族解放运动，二者汇合成世界范围的革命高潮，猛烈地冲击着世界资本主义制度。上述国内国际的矛盾，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从根本上动摇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信仰，开始寻求救中国的新道路。就在这时，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①它不仅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树立了榜样，也给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指出了彻底解放的道路。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开辟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影响。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的觉醒。1917年11月10日，就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第三天，上海《民国日报》以醒目的“彼得格勒戍军与劳动社会已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大字作标题，报导了俄国革命的消息，这是中国对十月革命的最早报道。接着，《时报》、《申报》、《晨钟报》、《东方杂志》、《太平洋杂志》、《劳动》月刊等一些主要报刊也相继作了报道。从这些简单的报道中，中国人民对俄国革命初步有所了解。十月革命后，约4万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去俄国做工的华工陆续返回中国，他们当中许多人亲自参加过十月革命，带回了许多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更加详细的情况。通过他们的宣传和介绍，中国人民了解到十月革命的更多的真实情况。这一切，在中国人民尤其是在中国

工人阶级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1917年11月20日，中东铁路的中国工人同俄国工人一起庆祝十月革命的胜利。开滦煤矿工人希望“工人之国”早日到来。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十月革命表示了真挚的欢迎和同情。1918年夏他致电苏俄政府和列宁，祝贺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并“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最大最深刻的影响和直接后果，就是为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十月革命之前，先进的中国人曾历尽千辛万苦，向西方学习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不论是林则徐，还是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无不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出路是什么？这个关系中国前途的重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受到巨大的启示。他们从十月革命的成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重新慎重思考中国的新出路。把长期以来向西方学习的视线和注意力转向苏俄。同时，他们从十月革命的生动事实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真理。从而把向西方资产阶级学习，转向研究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出现了一批歌颂俄国十月革命，赞同俄国十月革命，主张走俄国道路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

李大钊是十月革命后中国第一位正确地、全面地介绍十月革命的人，也是中国最早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在《言治季刊》第三期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这是中国宣传和歌颂十月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同18世纪的法国革命是“性质自异”、“非同同日而语”的两种革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会主义上之革命”。号召人们研究十月革命的经验，迎接世界新曙光的到来。同年 11 月十月革命周年之际，李大钊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进一步论述了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新时代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深刻预见和指出了十月革命必将成为“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李大钊的这些论述，标志着他已经从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

1918 年 12 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了《每周评论》。该刊第 16 号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李大钊以此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连续发表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1919 年 5 月，由李大钊主持下的《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陆续刊载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译文。李大钊还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作为专门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组织。五四运动正是在十月革命的伟大影响下，在中国社会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基础上，在中国社会内外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

四、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1918 年 11 月，历时 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等同盟国的失败和英、美、法、意、日等协约国的胜利而告终。1919 年 1 月，27 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拟定所谓对战败国的“和约”。实际上，这是一个由英、美、法、意、日五个帝国主义国家把持操纵的分赃会议，目的是如何在战后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和争夺世界霸权。

中国政府由于 1917 年 8 月正式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战线，

因而也作为战胜国，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旧国会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组成的五人代表团^① 出席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先后向“和会”提出两项提案，一是取消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取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和租界、关税自主的七项希望条件；一是废除 1915 年日本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乘机夺去的原德国在山东的各种权益。其中，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上有关中国问题的焦点。应该说，中国代表提出的两项议案是完全合理的。然而，由于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极大的特权，根本无视中国的主权和战胜国地位，对中国代表的提案以不属于和会讨论范围和权限之内为理由加以拒绝。只有山东问题，在讨论如何处置德国在远东太平洋和非洲殖民地问题时被列入讨论议程，但日本以武装占领既成事实和中国政府曾有“欣然同意”^② 的换文作借口，蛮横要求会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无条件转让日本，英、法、意等国支持日本。美国一贯奉行其“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对华政策，害怕其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受损，反对日本独霸山东，但孤掌难鸣，加上日本的坚决反对，最后也不得不对日妥协。4 月 30 日，英、法、美三国举行会议，拒绝中国代表出席，无理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权益全部转交给日本，并堂而皇之地写进了《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即《凡尔赛和约》。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但没有受到战胜国的待遇，相反连应该收回的权益也没有收回，竟和战败国一样遭到惨痛的宰割，这无疑是中国外交中的又一奇耻大辱。

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遭到的惨痛失败，粉碎了中国一些先进

^① 巴黎和会规定，中国只有两个正式代表名额，且只能出席与本国问题有关的会议，所以每次会议中国只能在五人中选派两人出席。

1918 年 9 月 24 日，驻日公使章宗祥和日本外相后藤交换山东问题换文，表示中国对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提议“欣然同意”。

分子原来对和会所抱有的希望和幻想，更进一步认清了帝国主义一丘之貉的本质。5月4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20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一文，揭露巴黎和会的骗局，指出要获得人类幸福和世界和平，“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上以《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为题，猛烈抨击帝国主义列强的强盗行径，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本来面目作了极为深刻的剖析，认为东西方列强都是一样的不讲公理的强盗，现在的世界是“强盗的世界”，在这充满强盗和没有公理的世界里，“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

这样，长期以来在中国人民中蕴藏、潜伏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情绪急剧增长发展，而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最终引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五四运动的爆发

1919年5月1日，上海《大陆报》首先在国内披露了巴黎和会中国外交“业已失败”的消息，京、津、沪等地各大报纸也相继登载了这一消息。顿时，中国外交失败的噩耗传遍全国，中国人民深为震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应甚为强烈，尤以北京学界为最。

北京学生得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后，群情激愤。5月3日晚，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的1000多名代表在北京大学集会，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破指写下了“还我青岛”的四个血字。会议一致决议：联合各界，力争国权；通电巴黎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通电全国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日本向袁世凯下达通牒要求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日子）举行示威游行；5月4日（星期天）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举行抗议和示威。

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中国大学、高等工业学校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天安门前，

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手持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的旗子，一致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交通总长，订立二十一条时的外交次长）、章宗祥（驻日公使，1918年“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之特权）、陆宗輿（币制局总裁，订二十一条时任驻日公使）三个卖国贼。集会结束后，按大会决议，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宣传，许多市民和群众加入学生队伍。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西口，遭到使馆巡捕和中国军警的阻拦，暴晒于炎日下两个小时仍不能通过使馆区，交涉毫无结果，学生们顿时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决定直接去找卖国贼曹汝霖问罪。游行队伍由东交民巷西口北转经东长安街直去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下午4时许，游行队伍到达曹宅门前。曹宅大门紧闭，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第一个跳进曹宅院内。跳入曹宅的学生们打开大门，游行队伍一拥而入，呼声震天，不绝于耳。曹汝霖慌忙躲入一小屋（箱子间）侥幸逃过学生们的追寻。正在曹家未及逃走的章宗祥被愤怒的学生痛打一顿，学生们捣毁曹宅器具，并放起火来。曹宅起火后，学生们陆续撤离，此时大批军警赶来，抓走了未及撤走的32名学生。

为了营救被捕学生，5月5日上午，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北京学界总罢课，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通电全国，请求各方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北京14所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组成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惩曹、陆、章三个卖国贼，致电巴黎专使，誓死力争收回青岛权利，决不在和约上签字。从此，北京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开始向有组织的方向发展。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北京政府十分震惊和恐慌。⁵

4 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研究对付学生的办法。总统府也在积极筹划准备发布取缔和镇压学生行动的办法。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拍发学生的电报（这一阴谋由于学生从外国电报局发报而未能得逞），教育部下令各校要严禁学生游行集会，否则“立予开除”，总之，北京政府想用高压政策将已发生的爱国学生运动镇压下去。

7 日，在学生总罢课的威胁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以学生不参加当日国民大会和各校复课为条件，被迫释放了被捕的 32 名学生。

北京学生为了实现爱国运动的目标，在被捕学生获释后继续坚持斗争。而北京政府在学生复课后仍继续对学生施以高压政策。同情爱国学生运动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于 9 日辞职出走。爱国学生除坚决要求惩办卖国贼和拒签和约的斗争目标之外，又掀起声势浩大的挽留蔡元培的斗争。9 日，北大学生“停课待罪”，坚留蔡校长。北大著名学者教授代表全体师生员工表示如蔡不留，一致辞职。继蔡元培之后，北京其他各大专院校校长也全体提出辞职。

11 日，旨在声援学生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表示和学生一起斗争。19 日，北京学联作出从即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再次实行总罢课的决定，当日计有 25000 多名学生参加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上街演讲，组织护鲁学生义勇队，开展维护国货，抵制日货运动。为了扩大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让外界了解北京学生运动的真相，力争全国各界的支持，北京学联派出学生代表，南下前往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九江等地，请求和呼吁援助。

由于北京爱国学生运动的直接目标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所以，以日本为首，联合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共同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坚决镇压学生运动。在这一背景下，北京政府不但对被迫提出辞职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三个卖国贼提出“慰留”，而且在国务会议上通过对德和约签字的

定。5月25日，徐世昌再次下令禁止学生游行、示威、集会和演说，并限三日内一律复课，否则将严惩不贷。6月1日，北京政府公开为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辩护，诬蔑学生“纵火伤人”、“举动越轨”，并明令查禁北京学联、护鲁义勇队。面对威胁，学生没有屈服和退却，6月3日起，北京20多所学校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和宣传，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将北京大学作为临时监狱，逮捕爱国学生1000余人。但学生并没有因此停止斗争，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的响应。最早起来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是山东省，因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由山东问题引起的，所以山东人民对此反映最为敏感。5月5日，济南各校学生纷纷上街演讲，展开爱国宣传。7日，山东各界代表在济南召开国耻纪念大会，要求力争青岛，惩处国贼，释放学生。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实行罢课。此外，天津、上海、长沙、武汉、成都、南京、西安、杭州、开封、安庆、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人分别在各地指导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甚至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以各种方式和行动响应国内学生运动。据不完全统计，从5月4日到6月3日的一个月间，在东起江浙，西到陕西，南到广东，北到黑龙江的中国广大区域内，有近百个城市和地区响应北京学生运动。北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席卷中华大地。

从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到6月3日北京政府对爱国学生实行大逮捕为止，爱国学生历时一个月的斗争，构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爱国运动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主要斗争形式是学生罢课。尽管参加运动的阶层局限于知识分子，缺乏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但青年学生以他们无畏的精神和不屈服的英勇斗争行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唤起了全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为

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向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拒签和约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6月3日北京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由北京学联向全国通电。6月4日，上海学联获悉后，立即行动起来，并向全国各省各界发出紧急电，呼吁全国一致行动，速起援救北京学生。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和码头工人，还有沪宁、杭甬两路部分铁路工人也于同日相继罢工。从第二天开始，上海工人罢工不断增加和扩大，遍及电车公司、机器制造厂、日商内外棉各厂、自来水公司、造船厂、烟草公司和海关等各行各业的工人。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最高峰，当天，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整个上海内外交通中断，各业全部停业，处于瘫痪状态。总之，从6月5日到10日，全上海罢工的企业、工厂达50多个，参加罢工的各行业工人多达六七万人。在上海工人的影响和推动下，长辛店、汉口、唐山、长沙、济南等地工人也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罢工，而且还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多种爱国活动，以其英勇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巨大的战斗力，给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

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和青年学生的推动下，从6月5日起，上海全体商人实行罢市。全市各业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一律关门停业。

与此同时，5日下午，上海各小学也一律罢课。至此，全上海大中小学实现全体罢课。这样，“六三”以后上海第一个在全国实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局面。

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迅速影响扩展到各地，全国有22个省